

◀ 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

翻译，权力，颠覆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西) Román Álvarez 编
M. Carmen-África Vidal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

翻译，权力，颠覆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西) Román Álvarez 编
M. Carmen-África Vidal



H059
41

北京
外研社
出版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京权图字: 01 - 2006 - 1918

© 1996 Román Álvarez, M. Carmen-África Vidal and the authors of individual chapters

This edition of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and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 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 权力, 颠覆 =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 (西)阿尔瓦雷斯(Álvarez, R.), (西)比达尔(Vidal, M. C. A.)编.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 1

(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ISBN 978-7-5600-6195-5

I. 翻… II. ①阿… ②比… III. 翻译理论—文集—英文
IV. H0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4318 号

出版人: 李朋义

责任编辑: 王莹

封面设计: 袁璐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北京市鑫霸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50×980 1/16

印张: 11

版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00-6195-5

定价: 17.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现有书目:

About Translation P. Newmark

《论翻译》

A Practical Guide for Translators G. Samuelsson-Brown

《译者实用指南》

Can Theory Help Translators? A Dialogue Between the Ivory Tower and the Wordface A. Chesterman & E. Wagner

《理论对译者有用吗? 象牙塔与语言工作面之间的对话》

Corpora in Translator Education F. Zanettin et al.

《语料库与译者培养》

Corpus-based Approaches to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S. Granger

《基于语料库的语言对比和翻译研究》

Crosscultural Transgression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I, Historical and Ideological Issues T. Hermans

《跨文化侵越——翻译学研究模式 (II): 历史与意识形态问题》

Electronic Tools for Translators F. Austerlühl

《译者的电子工具》

Intercultural Faultline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 Textual and Cognitive Aspects M. Olohan

《超越文化断裂——翻译学研究模式 (I): 文本与认知的译学研究》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A. Pym

《翻译史研究方法》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ethodology, and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a Model for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 (Second Edition) C. Nord

《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 理论、方法及教学应用》(第二版)

The Translator's Turn D. Robinson

《译者登场》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J. S. Holmes

《译稿杀青! 文学翻译与翻译研究文集》

* 本文库采用开放式结构, 今后还将陆续添加其他有影响的翻译研究著作。

Translating Literature: 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
A. Lefevere

《文学翻译: 比较文学背景下的理论与实践》

Translation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 D. Robinson

《翻译与帝国: 后殖民理论解读》

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Linguistic Theories Explained P. Fawcett

《翻译与语言: 语言学理论解读》

Translation and Literary Criticism: Translation as Analysis M. G. Rose

《翻译与文学批评: 翻译作为分析手段》

Translation and Nation: Towards a Cultural Politics of Englishness

R. Ellis & L. Oakley-Brown

《翻译与民族: 英格兰的文化政治》

Translation and Norms C. Schäffner

《翻译与规范》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R. Álvarez & M. Vidal

《翻译, 权力, 颠覆》

Translation Today: Trends and Perspectives G. Anderman & M. Rogers

《今日翻译: 趋向与视角》

Unity in Diversity? Current Trend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L. Bowker et al.

《多元下的统一? 当代翻译研究潮流》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 D. Robinson

《西方翻译理论: 从希罗多德到尼采》

只看题目——《翻译，权力，颠覆》，也许有的读者会以为此书纯粹是一部反传统、反权威、甚至政治上“反动”的作品。在译学迅速发展的今天，回头重读 1996 年由西班牙学者罗曼·阿尔瓦雷斯与卡门·阿弗利加·比达尔合编的这本只有 150 多页的书，我们可能觉得它太基础，甚至太“单薄”。其实，它汇集了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中翻译研究“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潮流中几位最具创意的主要人物的主要理论，属“开拓之作”。其关注的重点在翻译、文化与反文化的关系研究上，力求在文化与社会层面梳理并阐释翻译和译者的角色、功能及其种种权力结构。这里，《翻译，权力，颠覆》不仅关注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而且深究文化对翻译的复杂影响，属当代译学的文化政治学研究范畴。

众所周知，当今的翻译研究已成为人文社科研究中最具跨学科特质的“显学”之一。它不仅充分借鉴现代语言学、文学、文化研究的批评理论、方法与成果，而且将其学术视野扩展到商务、法律、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宗教、计算机科学、国际关系等领域。然而，翻译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它从一开始就同时得益和受制于“翻译作为一门技术或职业”的思维模式，在我国尤其如此。于是，我们的学者经常陷入“翻译理论能否指导翻译实践因而决定它是否有用”的论争及类似的困境。如果我们同意“任何一门学科都包含不同的研究层面和方法”的说法，那么，超越翻译实践、翻译技巧、翻译教学等层面的、对翻译进行认知及哲学等层次上的思辨，不仅可行，而且应当允许，甚至提倡。由著名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翻译理论家和实践家苏珊·巴斯内特与安德烈·勒弗维尔任主编的《翻译学论丛》（*Topics in Translation*），则充分显示了当今译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从 1993 年 5 月出版彼得·纽马克所著《翻译杂论》（*Paragraphs on Translation*）到 2006 年出版米歇尔·伍兹的《翻译米兰·昆德拉》（*Translating Milan Kundera*）、杰弗里·萨穆埃尔松·布朗的《翻译服务管理》（*Managing Translation Services*）、吉利恩·拉塞的《儿

童文学翻译》(*The Transla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为止, 已编辑出版了 30 余种。这套由 Multilingual Matters 有限公司出版的开放式《翻译学论丛》(以下简称《论丛》), 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宽广的环球视野, 把近二十几年来的翻译学新成果几乎“一网打尽”。无论是宏观上的理论探讨与构建, 还是机助翻译的技术改进, 这些论著都从不同的层面丰富着译学的学科性内涵。

由于对译学文化学派的理论基础(如福柯的知识与权力的论述、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等)比较认同并且较熟悉, 本人对《论丛》中研究翻译与社会、政治、民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的著作一直很“偏爱”。除了上个世纪 90 年代后期出版的里特瓦·莱皮哈尔姆的《文化撞击》(*Culture Bumps*)、巴斯内特与勒弗维尔合著的《构建文化》(*Constructing Cultures*)等“奠基式”的论著外, 本世纪初以来, 《论丛》中罗杰·埃利斯与莉兹·奥克利-布朗合著的《翻译与民族》(*Translation and Nation*)、赛义德·法伊克的《阿拉伯语翻译中的文化遭遇》(*Cultural Encounters in Translation from Arabic*)、奈杰尔·阿姆斯特朗的《翻译, 语言学, 文化》(*Translation, Linguistics, Culture*)、林恩·朗的《翻译与宗教》(*Translation and Religion*)、菲莉斯·扎特林的《戏剧翻译与电影改编》(*Theatrical Translation and Film Adaptation*)等论著, 更是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文化学派翻译研究。这些论著无疑构成了我们今天对阿尔瓦雷斯与比达尔合编的《翻译, 权力, 颠覆》重新阅读和理解的宏观语境。

《翻译, 权力, 颠覆》是一部主题鲜明、观点新颖、编排清晰的文集。全书共分 8 章, 它们之间既有密切的“翻译、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主题联系, 可作为译学文化学研究的一部教材或读本, 也可独立成篇, 按需求和偏好选用。除第一章为“序论”外, 其余 7 章分别论及“译者角色的重估”、“翻译规范与社会的权力结构”、“翻译中的文化特指项及其操控”、“文化翻译中的他者空间”、“从语言操控看翻译与语用学”、“社会互动框架下的翻译与反文化”和“美国 20 世纪的戏剧翻译与文学经典的形成”。下面对本书各章节主要的论点分别进行简要介绍和评述。

本书的第一章“翻译乃一种政治行为”由两位编者撰写。他们最基本的论点是, 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不是“中立的”(neutral), 它被附加上了一整套涵盖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心理等各个层面的价值和意义。而译者不仅自己身背这些价值的“包袱”, 而且必须在两种语言文化的网络中诠释和表述。因此, 译者往往受制于他们自身的

意识形态、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强势/弱势感觉、所处时代的主流诗学原则、文本语言本身、主流机构和主流意识形态对译者的期望、大众读者对翻译的接受能力等等因素。这样一来，翻译的行为 (the act of translating) 也就不可能是真正客观和中立的。当翻译进入社会层面时，它便影响我们如何认识并接受某部作品、某位作者、某种文学、甚至某种文化。借用米歇尔·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来透视，我们可以这样说，翻译 (translating) 实际上让译者进入了一个极其复杂多元的“权力网络”(a network of power relations)，即一种广义的意识形态活动，也就是本书编者明确宣称的“翻译乃一种政治行为”。这里，阿尔瓦雷斯与比达尔引用罗伯特·斯科尔斯在《文本权力》(Textual Power) 中的论述：处于被操控的历史时期的人们，他们的言说和话语无限扩散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因此，我们有必要尽可能地对各种媒介里各种文本显形、隐形的操控有清楚的认识。正如勒弗维尔所言，将一种文化的某些方面译入另一种文化绝非“简单的语义转换”(a simple semantic substitution)。相反，两种文化的自我形象 (self-images) 都力求在翻译中呈现出来，并为此而发生冲突。因此，通过翻译，我们可以了解一种文化在其演变的某一历史阶段的某些方面。作者在这一章结束时指出，我们要特别分析“权力是怎样进入文化翻译过程的”，它既是话语又是非话语层面的实践。

第二章“温顺与强大：译者角色的重估”出自英国华威大学著名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翻译理论家和实践家巴斯内特之手。巴斯内特开门见山，旁征博引，回顾并挑战翻译与创作、译者与作者、作者与读者在许多世纪以来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她指出，随着近年来翻译理论的发展，译者在“阐释、交换、转换”等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越来越受到重视。比如，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多元系统理论让我们看到，翻译在文学多元系统的形成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被赋予的颠覆性权力在后殖民主义和女权主义文本翻译中随处可见。原作者已随“原文”死去，而译者经过创造性的劳动使原文恢复生命，并将其带到一个全新的世界，让使用另一种语言的人们去感知和体验。巴斯内特在本章里对16世纪艾蒂安·多雷、托马斯·莫尔和其他先贤学者如约翰·德莱顿等关于翻译规则、译者角色、权力及翻译与文化等译论的评述，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清晰地重新审视译者的角色。在文章的结论部分，巴斯内特特别强调了译者的“可视性”(visibility)。她认为，到了20世纪90年代，译者被长期边缘化的尴尬处境终于被打破了，现在是翻译研究最好的时代，我们“转

了一大圈”，终于又重新认识并认可了译者创造性改写文本和改造世界的权力。这个权力很重要，因为“就翻译而言，权力可以决定译什么和不译什么，甚至包括怎样译”（孙艺凤，《视角、阐释、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254）。

1985年，英国文学翻译理论家西奥·赫曼斯主编了著名的论文集《对文学的操控：文学翻译研究》（*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为“操控学派”（Manipulation School）翻译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翻译，权力，颠覆》的第三章“规范与翻译抉择：一种理论框架”便是由赫曼斯撰写。在简要回顾操控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吉迪恩·图里关于翻译规范的定义、功能、类型等论述之后，赫曼斯把关注的重点放在翻译规范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层面。他认为，“规范”不仅仅与翻译的实际过程相关，而且与整个不同文化系统间的转化运作密切相联；“规范”实际上就是社会的权力结构和关系的总和。赫曼斯用较长的篇幅论述了“常规”、“规范”、“规则”、“法规”等概念的实质与关系。他指出，无论个人还是群体，他们都会因自己的社会处境或奋斗目标的不同，采取遵循或抵抗甚至颠覆主流“规范”的不同策略。翻译亦如此：“规范”向我们展示文化如何调控文本的引进与输出。这里，“语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象征权力结构等复杂关系的语境）尤为重要，因为翻译就是一种“交际行为”（a communicative act），而“语境”则在不同层面上左右译者的语言、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的“抉择”。借用特·尼冉亚那的话来说，翻译受宗教、种族、性别、经济等等话语的制约，我们进行翻译研究时，理应思考翻译的意识形态、社会文化和欧洲殖民主义等问题。在赫曼斯看来，任何抛开社会文化环境来谈翻译都是对翻译本身的损害。

第四章“翻译中的文化特指项”由西班牙翻译实践家哈维尔·弗朗哥撰写。他一开始就明确指出，翻译首先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重写过程，从来都处在各种理论与实践的纷争之中。因此，它最突出而又不用质疑的特征便是它的“历史性”（historicity）。由于翻译至少涉及两种文化，这就意味着一种不稳定的权力平衡问题，而权力的平衡在相当程度上又取决于输出或输入文化的相对势力。作者借用吉迪恩·图里关于文学翻译“规范”背后的“价值”论述，简述了语言、阐释、语用/互文、文化多元性与翻译“忠实”的关系；作者接着探讨了不同文化文本间的可译性问题。从描述翻译学的角度，弗朗哥重点分析了翻译中的文化特指项

及其操控的实质，将文化操控策略按程度分为“保留”与“置换”两大类，并详细解读了翻译文化特指项过程中译者必须应对的各种文本、超文本、内文本及“固有的”文化变项。最后，佛朗哥对《马耳他之鹰》(*The Maltese Falcon*)的三个西班牙译本进行了对比分析，用本土的翻译实践经验进一步论证了翻译中的文化操控问题，不仅与勒弗维尔、图里、伊文-佐哈等译论家的观点相呼应，而且把翻译中文化归化的主动性置于文本的输入方。

第五章“文化翻译中的他者空间”出自西班牙翻译学者奥维迪奥·卡沃内利之笔，主要分析了与翻译密切相关的“他者”及伊斯兰等非西方文化现实，是本书中最具“后殖民主义”文化翻译研究特点的章节之一。卡沃内利指出，自乔治·斯坦纳的《巴别塔以后》(*After Babel*) 1975年问世以来，越来越多的译学研究者接受了文化翻译的概念，认为译者因个人生活经验、价值观念、文化及历史背景等渗入翻译过程而使译文成了“再创造”。但是，斯坦纳并未就翻译作为文化间疏导者的冲突实质、翻译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权力关系、源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不同的意识形态等问题给予诠释。卡沃内利指出，由于“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的关系，文化翻译对传统的知识和“宏大叙述”的质疑/挑战已在西方思潮中展现：如何解析外国文化？如何客观理解看起来“奇异”的他者？如何对待自己和他人的历史现实？如何描述自己的文化疆界？卡沃内利以爱德华·赛义德在《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中对欧洲中心主义及西方对东方的殖民主义想象的批判等为理论基础，较为详实地对多元文化论、翻译中的文化再现、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对等与文化语境、殖民主义与文化霸权等议题作了论述。最后，作者联系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第三空间”概念及霍米·巴巴关于后殖民身份崛起语境中的文化再现理论，进一步阐明了批评理论的“第三空间”与变化着的文化疆界和“合法翻译”(legitimate translation)的关系。

在语用学已成为当代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翻译学、文体学等学科的“基本知识”的今天，本人认为第六章“翻译与语用学”是本书中最基础、最通俗易懂的一章，是翻译语言学派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理论总结。西班牙语用学与翻译研究学者恩里克·阿尔卡拉斯在简述了（与翻译是科学或艺术相对的）“翻译行为”(act of translation)、翻译中的“操控”和“对等”概念之后，回顾了翻译语言学派早期发展时结构主义等语言学理论对翻译学的贡献。阿尔卡拉斯接着用较长的篇幅详细论述了话语、语用对等、

语用意义、黏着、连贯性等语用学理论及其对扩大翻译研究范围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七章“翻译、反文化与美国的《五十年代》”由《当代翻译理论》(*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一书的作者、美国翻译理论家埃德温·根兹勒撰写。他首先对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的译学“理论”发展表示不满,认为它们多有不集证据、“闭门造法”之嫌。接着,根兹勒较为详细地评述了文化翻译理论家伊文-佐哈的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的精彩(如翻译在“弱势”文化中的“主导”作用之论述得到世界众多个案的支持和印证)与不足(如关于翻译在“强势”文化中只起“次要”作用、翻译文学与原创文学相比欠缺创新等论述缺乏事实和数据的支持)。本人认为,根兹勒所挑战的不仅仅是这些论据不足的问题,同时还有多元系统论背后仍然隐含的某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尽管多元系统论也承认“中心与边缘”、“强势与弱势文化”的关系是复杂的、动态的。之后,根兹勒以米歇尔·德塞尔托《日常生活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等作品的译本、梅尔文对早期西班牙歌谣的翻译、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诗人/翻译/反文化代表罗伯特·布莱对内鲁达、马扎多等的诗歌翻译为例,力图在社会互动的理论框架里探讨译文的颠覆性问题,同时证明“弱势”文化有时也影响“强势”文化,为当时的多元系统理论提出了朝更深更完善方向发展的期望和要求。

本书的“压轴章”(即第八章)“翻译与经典的形成:美国戏剧翻译九十年”出自《论丛》主编之一的译学大家勒弗维尔之手。这是一篇既有新颖的理论构建又有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的佳作。勒弗维尔十分明确地提出文学翻译就是“一种文学文本重写”(one way of rewriting),或者说“再现”(representation),又或说“投射形象”(projection of image)。对许多外国文学读者来说,阅读翻译作品的“常态”就是把它们当作“原著”来看,因为“译著”和“原著”都无一例外地受到其社会文化环境变化的影响和其他诸如政治、经济、宗教、种族、阶级、心理等因素的制约。勒弗维尔以1900年至1988年美国高中和大学里使用的各种(西方)戏剧选集慢慢演变成“经典”的过程为研究对象,剖析《主要欧洲戏剧家》(*The Chief European Dramatists*)、《世界戏剧》(*World Drama*)等“选集”的选编原则、主题倾向、意识形态、美学标准、时代特征、民族(如古希腊、法、德、意、英、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等等)戏剧的代表性诸方面,进而思考文学翻译如何影响文学经典的构建。这里,作者提醒我们要特

别注意权力是如何进入文学翻译的，在文学“重写”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它们背后的种种原因。

今天中国的翻译研究发展十分迅速，许多高校纷纷建立翻译系、翻译学院、翻译研究所，对译学理论和流派的引入和借鉴已开始呈现健康的学术争鸣之势，不仅有对中国传统译论和西方传统语文学派的继承，对语言学派、诠释学派、目的学派、文化学派的开放性评介，更有不少学者专门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生态批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谜米学等视角深入探讨翻译研究的各个层面。然而，正如刘绍铭先生为《西方翻译理论精选》（陈德鸿、张南峰编，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作序时所言，“‘新’派出现，并不表示‘前辈’的著述已成明日黄花。眩人眼目的学术七宝楼台，是靠各种色彩不同的玉石砌成的”。毫无疑问，由阿尔瓦雷斯与比达尔合编的《翻译，权力，颠覆》一书已成为当代译学研究（尤其是文化学派翻译政治学研究）这七宝楼台最独具一格的奠基石，出版10年后依然耐看。此书收录的8篇论文，大都语言简明，行文流畅，视角独特，观点鲜明，非常适合大学英语高年级本科生、英语硕士/博士研究生、文学/文化/翻译教师及研究者阅读和参考。

毛思慧

澳门理工学院翻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Contents

Acknowledgements	xvi
1 Translating: A Political Act <i>Román Álvarez and M. Carmen-África Vidal</i>	1
2 The Meek or the Mighty: Reappraising the Role of the Translator <i>Susan Bassnett</i>	10
3 Norms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Translation: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Theo Hermans</i>	25
4 Culture-Specific Items in Translation <i>Javier Franco Aixelá</i>	52
5 The Exotic Space of Cultural Translation <i>Ovidio Carbonell</i>	79
6 Translation and Pragmatics <i>Enrique Alcaraz</i>	99
7 Translation, Counter-Culture, and <i>The Fifties</i> in the USA <i>Edwin Gentzler</i>	116
8 Translation and Canon Formation: Nine Decades of Drama in the United States <i>André Lefevere</i>	138
Notes on Contributors	156

Acknowledgements

The editors would like to express their gratitude to all the contributors in this book for their work,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Special thanks should be extended to Professors Susan Bassnett and André Lefevere for their sustained help with this project over the last two years, and for the much valuable criticism and advice they gave us. We are also grateful to Prof. Fernando Toda, who held the first chair in the are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Spain at the University of Salamanca, for his lucid and perceptive comments on the contents of the book. The editors would also like to acknowledge their great indebtedness to Prof. Ramón López Ortega, whose annual Symposia on Transl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Extremadura, attended by thousands of translators, teachers and students, did a great deal to develop the interest in this area in Spain.

R.A. and M.C.A.V.

1 Translating: A Political Act

ROMÁN ÁLVAREZ AND M. CARMEN-ÁFRICA VIDAL

Translation, as scholarship (to which it is integral), is a constant forward movement of approach to another cultural space. A constant movement, because real knowledge of the other culture is never achieved, be it at the linguistic or semiotic level. And a forward movement, because it implies a goal, the consecution of sufficient data of an ideal, abstract space which is linked with the progressive advance of the civilizational frontier. Any other space is therefore a shifty signified.

Lawrence Venuti

It could be said that throughout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ranslation Studies have evolved on the par with the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ociety and have been a reflection of them. As communications made the world smaller every day, the translator became more and more of a necessity. From the eagerness to consider translation as a science or the obsession to give a definitive, prescriptive and sole version of a text, we have moved on to a descriptive outlook which likewise, whether we like it or not, is political. As Susan Bassnett states in her essay in this book,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attitude towards translation has radically changed: 'Globally, this is the age of mass communications, of multi-media experiences and a world where audiences demand to share the latest text, be it film, song, or book simultaneously across cultures. Nor has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as a world language slowed dow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it has, on the contrary served to emphasize the significance of translation, as questions of cultural politics appear on the agenda . . . th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is inevitably an exploration of power relationships within textual practice that reflect power structures within the wider cultural context.'

Translation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paradigms of the clash between two cultures. Although excellent studies already exist on this function of translation – particularly stemming from the so-called 'Manipulation School' – there remains much work to be done with regard to the semiotic and hermeneutic problems translation poses. Contemporary studies on translation are aware of the need to examine in dep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in a given culture and its transmission, relocation, and reinterpretation in the target culture. This obviously has to do with the production and ostentation of power and with the strategies used by this power in order to represent the other culture. Translation is *culture bound*. It makes us ponder, as Edward Said would put it, how knowledge that is non-dominative and non-coercive can be produced in a setting that is deeply inscribed with the politics, the considerations, the positions and the strategies of power. The translator can artificially create the reception context of a given text. He can be the authority who manipulates the culture, politics, literature, and their acceptance (or lack thereof) in the target culture. He may stay 'behind the language of the original with its local densities, idiomatic variables, and historical-stylistic accident'. The translator views his source 'often via an intermediate paraphrase, as a feature, almost non-linguistic, of landscape, reported custom, and simplified history'.¹ He knows that:

To experience difference, to feel the characteristic resistance and 'materiality' of that which differs, is to re-experience identity. One's own space is mapped by what lies outside; it derives coherence, tactile configuration, from the pressure of the external. 'Otherness', particularly when it has the wealth and penetration of language, compels 'presentness' to stand clear.²

Therefore, he should 'situate precisely and convey intact the "otherness" of the original',³ but his knowledge of the target culture may not be used objectively. On the contrary, he may be influenced by the relationships of power that his culture maintains with the target culture. Obviously, cultural hegemon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ranslation:⁴ '... an account of the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by one people about another is most unlikely to be the record of a progressive revelation of objective truth, achieved through the disinterested quest of learning for its own sake.'⁵ As Theo Hermans argues in his essay, translating is a matter of adjusting and manipulating a ST so as to bring the TT into line with a particular model and hence a particular correctness notion, and in so doing to secure social acceptance, even acclaim.

Approaching a culture inexorably implies beginning a process of translation. It is not merely a question of there being diverse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erms which pose evident translation problems⁶. Sometimes there is a void because something does not exist in the other culture or because it has a very different meaning or value (thus, the well-known example of 'Lamb of God' in the case of the Eskimos). In order for translation to exist, there must have been not only a perfect assimilation of the linguistic content, but also of the experience of the other culture, without the pressures of one 'superior' culture over another. As it is approached today, translation tackles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ultural problems: the death of what Lyotard has called the '*Grand Récits*'; the consequences of colonization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other cultures; the problems springing from the rebirth of xenophobia and racism;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xotic, not in terms of false imaginary constructions, but as an historic reality in itself which must be respected disregarding hierarchical cultural boundaries. It could be said that translation is a provisional way to encounter the strangeness of languages, to paraphrase Benjamin, although it can also become a form of control, particularly if there are already a series of preconceived stereotypes about a given culture.

A characteristic example might be the translation of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 'hybrid,' or 'métisse'⁷ – in which the exotic discourse can be manipulated to such an extent as to conceive it, Edward Said argues,⁸ as an invented geography, an imaginary space built according to the ideology, cultural values and norms of the West – the Oriental orientalized – something as it should have been but not what it in fact is. When translating, one ego can be idealized, e.g. by selecting the vocabulary over another, by placing more emphasis on the familiar part of that culture or on its most exotic side; on that which makes us closer to it or 'superior': 'exotism' as opposed to 'naturalism'.⁹

It is no longer possible, therefore, to speak of a textual translation; rather, the context should always be born in mind because 'the opposition between "a contextual interpretation" and one that is not contextual is entirely spurious. Nothing has meaning "in isolation." The problem is always, what kind of context?'¹⁰ The problem is, indeed, what kind of context? Who chooses it? Why and how was it chosen? Th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have even changed many of the accepted ideas of translation theory.¹¹

The importance of the cultural milieu of each language is such that it could be argued that its significance cannot be found at a linguistic level (neither SL nor TL) but rather on a third level: in the cultural space that emerges from the clash (although, ideally, intersection) between the two